

在理論的年代

李有成 ◆ 著

在理論的年代／李有成著．-- 初版．-- 臺北市：允晨文化，2006〔民95〕

面；公分．--（允晨叢刊；109）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86-7178-10-6（平裝）

1.文學 - 評論

812.8

94026358

允晨叢刊 109

在理論的年代

作者：李有成

發行人：廖志峰

主編：李怡慧

責任編輯：洪虹玲

美術編輯：劉寶榮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傳真電話：(02)2507-4260

網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eas@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二〇〇六年三月十日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2523號

電腦排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製版：利全美術印刷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協成裝訂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240元

ISBN：986-7178-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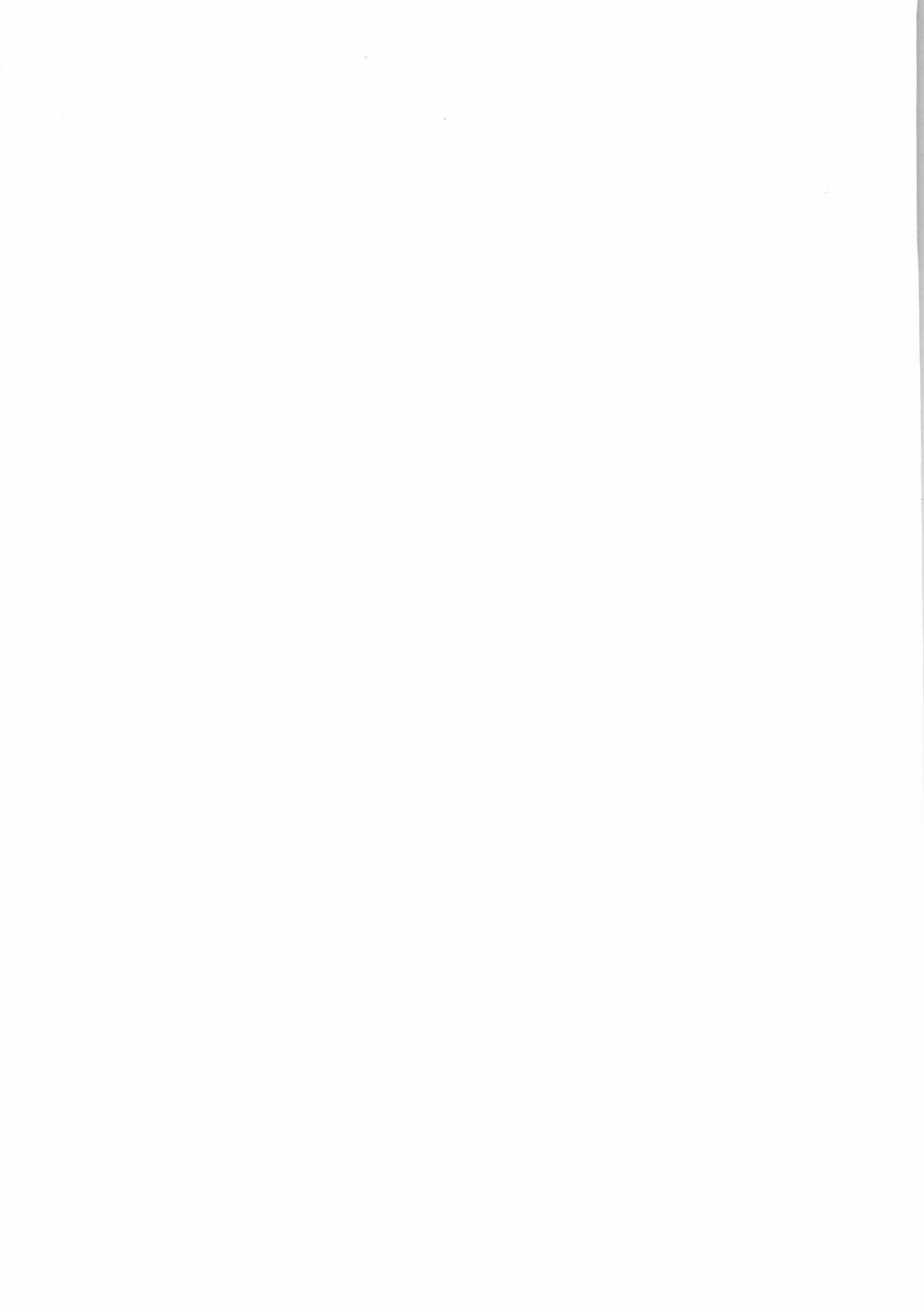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201011

允晨叢刊 109

在理論的年代

李有成一著



目錄

自序	4
緒論：在理論的年代	9
第一輯	
一、自傳與文學系統	24
二、《巴特論巴特》的文本結構	54
三、《家變》與文類成規	81
第二輯	
四、白璧德、新人文主義與中國	102
五、《拉奧孔》的文學中心主義	131
六、閱讀行為的倫理時刻	149
七、理論旅行與文學史	159
第三輯	
八、階級、文化唯物主義與文化研究	174
九、《關鍵詞》與威廉士的「文化與社會」方法	191
十、帝國與文化	204
十一、帝國主義、文學生產與遠距離控制	230
十二、《密西西比的馬薩拉》與離散美學	251
論文出處	271
索引	273

自序

睡夢中被一陣警笛聲驚醒，起身開燈抓起桌上的手錶，是凌晨三點多。窗外傳來巴士啟動的聲音——這個古老的城市現在除了有夜班公車外，還有二十四小時服務的公車。間或還隱約可以聽到附近酒館外邊街頭酒客吵鬧的醉言醉語。坐在書桌前，桌上躺著尚未看完的小說和平板電腦，我想起這本論文集還缺少這麼一篇序文。

這次到倫敦是在七月七日地鐵與公車爆炸案發生後一個多月，最大的感覺是，比起一年前，警笛聲似乎增多了，地鐵站、火車站，以及一些公共場所不只警力倍增，不時還聽到廣播提醒旅客留意沒有人看管的行李，整個城市似乎稍微緊張了一些。儘管一般人的生活沒有受到多大影響，地鐵、公車、火車照樣忙碌，但是我就不只一次碰到警方在街頭圍欄路檢的情形，氣氛確實和過去有些不一樣。有一天一大早我出門到學校附近土耳其人開的報紙商店買咖啡和報紙，宿舍路口竟然站了近十位男女警員，我路過時和他們道聲早安，卻也不好停下來問說發生了什麼事。

氣氛的確是有些不尋常。不管是9/11或者7/7，恐怖攻擊發生後當權者無不信誓旦旦要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但是怎麼可能？9/11之前和之後到過美國的人就知道有多麼不同。申請簽證和機場安檢的羞辱性監控規定使人覺得自己是位不受歡迎的客人。連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都認為，9/11之後，美國人傳統對待外國人的「高貴而胸襟開放的心態似乎已為稍稍的不信任所取代」（Borradori,

27)。著名的文學與文化期刊《邊界2》(Boundary 2)在二〇〇五年夏季號的卷首刊登了一則聲明，其內容如下：

二〇〇三年九月，美國財政部外國財產管制局嚴令禁止美國人在未獲該局的許可下編輯出版受經濟制裁國家的著作。二〇〇四年三月，財政部又同樣突然廢止此禁制令。《邊界2》贊同廢止這個規定。此禁制令對阻止恐怖活動幫助不大，但卻因為箝制知識交換而傷害到民主的自由言論，沒有知識交換這個世界將永遠難以免於恐怖活動。對於美國政府處心積慮自認有權剝奪其公民求知、發言及思考的自由，《邊界2》表示強烈不安。

在所謂民氣可用的氛圍之下，在籠天罩地的反恐思維之下，美國國會迅速通過了二〇〇一年航空與交通安全法和愛國者法，^①政府也設立了龐大的國土安全部，把愛國主義和國家安全無限上綱，對民主與人權的戕害時有所聞，《邊界2》的聲明所透露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英國在經歷了7/7倫敦爆炸案之後，也在積極研擬新的反恐法，企圖賦予警檢單位更大的權力，包括要把被懷疑涉嫌者的羈押期延長到九十天，知識界和輿論界為之譁然，認為這麼做恐怕會嚴重侵犯人權。^②

①所謂愛國者法只是俗稱，此法案有一個冗長的名稱，即「提供攔截與防阻恐怖主義所需之適當工具以團結並強化美國法案」(Uniting and Strengthening America by 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 Act, 簡稱USA PATRIOT Act)。

②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附記：這個反恐法在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

在類似的新的法律與措施之下，怎麼可能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這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來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那裏還是「我們的生活方式」呢？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文學教授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9/11之後看到她的國家所做的盡是「拉高民族主義論述，擴充監控機制，凍結若干憲法權利，並開發某些有形和無形的官檢形式」（xi）。她認為這種種反民主或限制民主的做法其實只會讓恐怖分子的意圖得逞而已。官方說法更是立即訴諸非楊即墨的極為簡化的二分法：不是同志就是敵人——如果你反對我或不支持我，你就是同情恐怖分子，就是不愛國。這樣的論述帶來了明顯的寒蟬效應，學術界與許多公共知識分子只有識時務地噤聲，輿論界也知趣地在言論上自我檢查。整個論述等於又回到不合時宜或過時的二元論：東／西、他們／我們、野蠻／文明的二元對立等（Butler, 2-3）。這種把複雜現象過度簡化的二元對立只會造成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所說的暴虐層系（a violent hierarchy），其實是思想的怠惰與公共領域的萎縮，正是這本論文集的許多章節一再質疑與批判的。

序文寫到這裏，天色漸亮，我也睡意全消，宿舍外的公車站更是交織著吵雜的人聲和車聲，這個古老的城市已經甦醒，新的一天又展

經過英國國會下議院漫長但相當激烈的辯論之後投票，結果為322票對291票，九十天羈押期的規定未獲通過。執政的工黨在下議院原有六十六席的多數票，但其後座議員（backbenchers）大量跑票，表示強烈反對，致使工黨遭遇自一九九七年執政以來最大的挫敗。輿論界一般將此重挫歸諸於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錯誤的政治判斷。九十天的羈押期經修改為二十八天後通過，已比原來規定的十四天增加了一倍。這個法案仍須經上議院通過後才算完成修法程序。

開了。我想到土耳其人的報紙商店去買份咖啡和《衛報》(The Guardian)，今天仍會是忙碌的一天。

這本書的出版獲得許多人與機構的支持與協助，在結束這篇序文之前，我想藉這個機會表示自己誠摯的謝意。齊邦媛、顏元叔及張漢良幾位師長在我求學的不同階段啓迪我對文學理論的興趣。朱炎、田維新、滕以魯、周英雄等師長對我的期許與鞭策，三十年如一日。朱炎老師當年鼓勵我到中央研究院工作，我大半生竟因此未離開過學術研究。單德興、何文敬及紀元文的多年共事與相互砥礪，使我獲益甚多。老朋友陳端獻多次敦促我將論文結集出版，並且答應讓我在書中採用他早年完成的畫作 *Laocoön*。過去這些年我研究、教學及行政多頭忙碌，助理曾嘉琦給我的協助是不可或缺的。這本論文集的初稿輸入和編排，乃至索引的整理，都是嘉琦完成的。對於大家的鼓勵、支持及幫助，我由衷感激。書中的論文之能夠順利完成，得力於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長年支持與國家科學委員會的長期資助。中央研究院的同事黃進興兄熱心把這本書引介給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並納入在學術界已有定評的允晨叢刊，我要特別向進興兄致謝。我還要謝謝允晨編輯部的李怡慧小姐和其他同仁費心本書的編校工作。二十多年來容慧辛苦持家，使我稍能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術與行政工作，是最銘感於心的。是爲序。

李有成

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倫敦

引文書目

Borradori, Giovanna. *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 Dialogues with Jürgen Habermas and Jacques Derrid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 of Chicago Pr., 2003.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4.

緒論：在理論的年代

在整理這本論文集時，我應邀參加一個有關當代法國理論的座談會。我一邊校訂這些論文，一邊回想撰寫這些論文的經過，並且反省處理各篇論文的理論與方法。座談會也讓我思考理論與方法的角色。我深信理論與方法的重要性。處理任何研究議題不可能沒有理論與方法，否則恐怕不得其門而入。簡單地說，方法主要涉及處理議題的程序與步驟，理論則是支撐整個方法背後較為系統性的假設與信念，方法是離不開理論的，重視理論因此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求學的年代正好是所謂大理論（grand theory）日正當中的年代。按伊格頓（Terry Eagleton）的說法，「當日常的社會或知識實踐已經失靈，出現麻煩，且急需自我反省的時候，大型的理論就會出現」（Eagleton, 1996: 190）。大約自一九七〇年代之後，許多重要的名字幾乎同時上場，一時之間風起雲湧，整個人文科學（human sciences）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巴赫汀（Mikhail Bakhtin）、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盧卡奇（Georg Lukács）、阿多諾（Theodor Adorno）、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巴特（Roland Barthes）、拉岡（Jacques Lacan）、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可以說是人文科學許多領域裏家喻戶曉的名字。即使是對理論沒有興趣的人，在那個年代大概也不免會聽到其中的幾個名字。這是歐

陸，而在英語世界，當時還有影響力日增的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薩依德（Edward W. Said）等。差不多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了一九二〇、三〇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和布拉格語言學派（Prague Linguistic Circle）——也許是冷戰的關係，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們對這兩個理論學派的了解相當有限。當然後來我們更接觸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根植於第三世界反帝與反殖民政治的後殖民理論。范農（Frantz Fanon）、孟密（Albert Memmi）、塞杰爾（Aimé Césaire）、桑果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等是另一批耳熟能詳的名字。至於霍爾（Stuart Hall）、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峇峇（Homi K. Bhabha）等的理論則是較後來的事了。台灣的情形尤其特殊，一直到解除戒嚴之後，我們才能夠有機會公開且較有系統地閱讀馬克思主義，卻發現拉克勞（Ernesto Laclau）和莫芙（Chantal Mouffe）等人已經在討論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了，雖然在我們的政治社會裏仍然有人沉湎於冷戰時代反共與恐共的思維窠臼中。總之，僅就理論而言，套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話說，這真是有趣的時代（interesting times）。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隨著巴特、阿圖塞、傅柯、拉岡等先後棄世，大理論其實開始日漸式微。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薩依德病逝紐約，二〇〇四年十月八日德希達於巴黎辭世，在象徵意義上等於宣告一個大理論時代的結束。有時我們可能忘了，德希達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他那篇批評李維史陀的著名論文〈人文科學論述中的結構、符號及戲耍〉（“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s”) 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理論的確跟著我們夠久了。大理論的時代確實已經過去，這種規模與野心的理論也許一時再也不容易看到，有些學者如魏廉思（Jeffrey Williams）甚至認為，我們其實已經進入後理論（posttheory）的世代。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從此鬆一口氣，從此可以不必理會理論，然後回到伊格頓所謂的「前理論的天真無邪的時代」（Eagleton, 2003: 1）。理論其實已經成為我們知識傳統的一部分，成為許多學術領域裏必需的裝備，甚至自成領域，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孟子說過，「觀於海者難為水」，理論改變了整個人文科學，也改變了我們了解文本、了解文化實踐與社會現象，乃至於了解世界的方式。理論不會消失，只會以不同的面貌不斷出現。

在整理這本論文集的時候，我還翻閱了過去這些年讀書思考留下的部分筆記。其中有一則大概寫於十年前，看起來像是一篇論文的開頭（但我不記得有什麼場合需要寫這篇論文），很能說明當時我的一個主要關懷。這則筆記談的是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生產的關係。我把筆記完整抄錄如下：

我們不妨把文本視為符號有意義的組合。大部分的文本生產者——譬如作家——無不希望藉此組合將其所徵用的符號予以固定，目的在穩定其符意，希望符意能因此而被囚錮於他所設定的符號的籠牢當中，不致於游移浮動而引生誤解。大部分作家因此希望讀者能依據他對符號的安排正確解讀其作品。基本上符號有其時空或文化的獨特性，因此任何符號都應被視為時代的符號（signs of the

time)；換言之，符號並非無中生有或者在文化真空的狀態下發明的。這正是文本生產活動的弔詭之處。文本生產者大抵希望其產品能夠與其生產環境——稱之為現實或指涉亦無不可——密切相關，文本的生產過程於是成為模倣的過程，文本也順理成章被視為對生產環境的反應或反映。這是各種版本的模倣論（mimesis）的基礎，也是文學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的根本依據。傳統文學批評籠統所謂的時代精神或社會意向都是此生產環境的抽象描述。

比較精確的說法是，生產環境除了指涉生產條件與生產關係之外，尚包括意識形態環境，在同一意識形態環境中可能還有其他與之並存、抗衡、挑戰的意識形態。文本的生產活動於是成為不同對立力量之間意識形態頗頗競逐的創造性文化、政治或社會實踐。而界定這些生產活動的則包括了散佈於生產環境中的各種思想、價值、理念及態度。文本因此也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是環境的權力意志運作下的產品。

然而矛盾的是，文本的生產者又大都希望他的產品具有自主性，能夠不受其生產環境的限制，甚至超越其生產環境，成為自身俱足、獨立自主的美學或物質存在；其價值不僅為當時當地或一時一地的讀者或批評家所領受，同時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其他時空也能夠佔一席之地。在此情形之下，文本在生產之後，並不會因為脫離其生產環境而頓告消失，反而獨立於其生產環境之外，成為典律文本或者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謂的文化資產或文化象徵的一部分。除此之外，符號的選擇與安排其實還涉及艾略特（T. S. Eliot）所說的個人才具，顯然並非純粹由生產環境所支配。文本的生產因此也具有個

人強烈的權力意志在內：符號的部署，甚至文本類型的選擇，在在涉及許多個人因素，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是個人權力意志的斷然決定。

上述的說法可能很難獲得後結構主義者的完全共鳴。德希達的名言「文本之外無他」或「別無外在文本」（“Il n'y a pas de hors-texte”）經常被援引說明後結構主義者對待文本的立場或對文本性（textuality）的看法。後結構主義者相信意符的自由戲耍以及符意的浮動不穩，唯一可以信賴與依賴的就是文本，文本之外再也沒有任何指涉。換言之，在掙脫了指涉的牽絆之後，文本於是自成一個開放系統，一個可以不斷自我解構的延異空間。羅遜（Richard Rorty）即據此稱之為文本主義（textualism）：「在我們的世紀，某些人寫作彷彿除了文本之外，就別無其他，就像十九世紀時有人相信，理念之外，別無其他」（Rorty, 139）。

德希達的解構計畫，一言以蔽之，目的主要在批判他所謂的理體中心主義（logocentrism），否定直指根源，回到最初始源的可能性——所有意義、真相、指涉都在文本化的過程中遭到解構而不再封閉與穩定。文本化的本意原是為穩定意義、真相、指涉，然而反諷的是，由於符號的變動不居，文本化的結果適得其反，在文本化的過程中符號的指涉——包括文本的生產環境及其物質條件——反而不復可得。用安德生（Perry Anderson）的話說，德希達——還有傅柯——等於把我們帶回到「晚期尼采的哲學遺產去，回到尼采哲學中對真理錯覺和意義穩定性的無情抨擊中去」（46）。當德希達說「文本之外無他」，他的原意——這個用辭恐怕也不符後結構主義的要求——其實不在否定指涉的存在，其重點在於強調指涉之不可復求。指涉既經文

本化，即成為文本的建構，因此只能潛存於文本之中，再也無法外求。柏德生（Lee Patterson）即曾對德希達的說法提出類似的解釋：

當德希達聲名狼籍地說，「文本之外無他」，他只是重述許多社會文化史家的立場，即現實衍生於文化和論述。用柯勒（Jonathan Culler）的話說，「政治所關切的現實以及現實被操縱的形式，與論述形式和表意系統無法截然分開」。當然，此一計畫可能因此忽略了施展權力的社會、經濟及政治建制，但也並非如此不可；當然，此計畫也可能讓我們將力量遮覆於結構之中，但也沒有任何事物要求非如此不可。誠然，倘若我們將解構主義置於史學實踐之中而非與之對立，那麼我們可以將解構主義視為一種分析法式，其目的在於了解文化意義的生產。（71）

柏德生的話說得拐彎抹角，其用意不外乎想在解構主義中重建指涉——他所謂的「現實」或「文化意義」，或者上文提到的文本的生產環境——與文本的關係。對他而言，解構主義是一種分析法式；也就是一種方法，其分析對象則是文本。指涉即潛存於文本當中，不在文本之外（extratextual）；是文本生產指涉，或者說文本是中介者，介於讀者與指涉之間。

有一點這則筆記沒有指出的是，意識形態生產其實也仰賴文本生產，因此文本生產條件的再生產決定了意識形態生產。不過這則筆記倒是相當清楚說明了文本的生產與領受如何緊扣情境（situated），如

何受制於社會、經濟與意識形態環境。薩依德嘗以現世性（worldliness）和環境性（circumstantiality）等用辭來描述文學介入現世的複雜現象，而對耽於所謂文本性迷宮的活動則頗有微辭，他認為這無異於接受了文學實踐的不介入原則。文本性於是淪為文學理論中「神秘與無菌化的題材」（Said, 3），而文本則變成非歷史與非社會的孤立個體。對薩依德而言，文本存在於現世，因此文本是現世的，本身就是個事件，也是其所置身與被詮釋的社會、生活及歷史時刻的一部分（4），為人世中的種種所牽絆；文學批評的工作就是要揭露文本與其生產和領受時空環境之間——薩依德所說的現世——的糾葛或共謀合計。依此而論，文本是過去的，批評則屬於現在。批評的目的在於解放，在於將被壓抑、換置或泯滅的聲音自文本的文本性中解放出來（53）。

這本書收錄了十二篇我較偏於理論的論文，為了方便閱讀，我把這十二篇論文分成三輯。這些論文一方面反映了我多年來的若干主要知識關懷，另一方面也同時記錄了我在理論上走過的痕跡。這些痕跡標示我曾經如何擺盪在文本性與現世性之間，我的關懷又如何從文本性走向現世性。這樣的走向正好說明在文本性之外我還有其他迫切的關懷。除了文本性的分析與描述，文學與文化研究顯然還有更大更根本的計畫。我相信不僅文本緊扣情境，理論也無法脫離情境，因此理論也是現世的。就像文本那樣，理論也是事件，可以使某些事情發生。

從這本論文集也可以看出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ism）的符號理論對我的影響。後結構主義對符號的批判造成意義的浮動，因此一